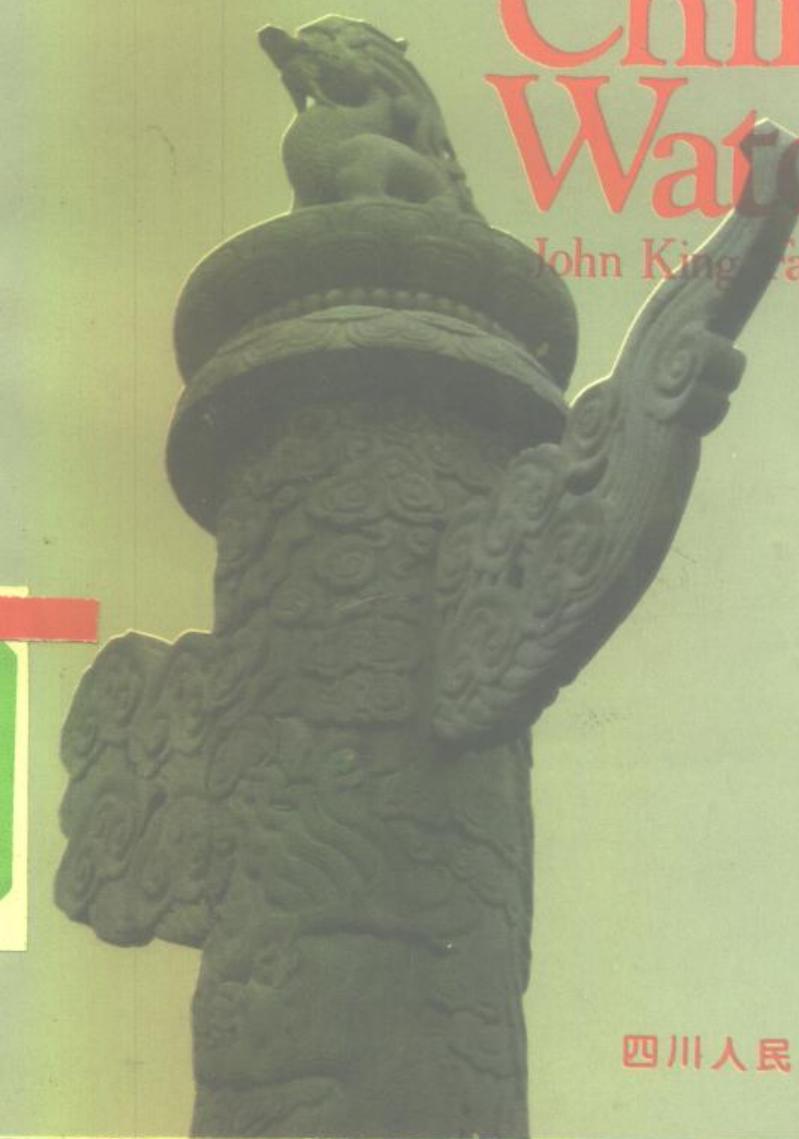


[美]费正清 著

觀察中國

China
Watch

John King Fairbank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吴 勉 扬 萍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观察中国

[美]费正清 著
袁晓梅 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mm/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45 千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1663-2/D · 365 印数:1—18,000

定价: 3.40 元

前　　言

近来，中国充满活力并将眼光转向我们。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刚从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们欢迎中国这种来得太迟但毕竟已经到来的面向市场的转变。美国当然也受到这种生利发财的鼓舞。展望未来，我们中有些人希望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能像日本近年来的情况一样与我们更多地打交道——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廉价的商品与我们竞争。按照这种想法，中国人最终会为我们提供衣物和家用器具，而我们会用多余的农产品给予回报。

但是，中国会真的变成另一个日本吗？这种想法有可能只是美国对中国这头睡狮以及对长期以来与中国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贸易的另一次梦想。也许，那些曾经阻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障碍会同样继续影响她今日的进步。

两百年来，西方一直梦想与中国进行大宗贸易。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头脑

中的中国形象是把现实过滤后塑造的，而现实又是从偏见与经验积累中得到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写的报告主要包括的也就是偏见和经验。

本书收集了一位历史观察家有关中国以及近 15 年来中美关系的著述。坦白地说，中国在公众中的形象形成过程中，我也起过一点作用。作家们在著书、撰文和拟就评论时，会对譬如有关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反应，他们实际上是在他人的印象之上得出自己的印象和评论。很快，现实和形象就结合起来了。

这种经过两次过滤所得的中国形象能代表什么呢？一本书是否也在反映他人的观点呢？我们知道，杂志和报纸的编辑以及书籍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有无出版的价值。本书从多方面和多角度告诉我们，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一些读者，特别是他们喜欢这本书时，定会感到书中的观点能代表公众的看法。假定书中的观点是有倾向性的、不完整和非结论性的，它可以接受公众观点的检验。

本书的引言（部分引自 1985 年 12 月美国历史协会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反映出我的兴趣所在，即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其余五部份都从讲述历史开始，有些章节是用当今流行的观点开始论述的，而另一些章节实际上只是再版。

献给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西奥多·H·怀特

(1915—1986)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美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	(1)
第一部分 对帝国主义的新认识	(10)
一、鸦片的促动.....	(11)
二、传教士和牛仔的态度:美国与中国的 “特殊关系”.....	(15)
三、传教士在中国的新闻事业.....	(20)
四、带有神奇色彩的传教史.....	(22)
五、汉学研究误入歧途:一名在北京的外国骗子	(29)
六、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双重态度.....	(36)

第二部分 调察毛的中国	(42)
七、杰出的美国人约瑟夫·史迪威和他对 中国的使命	(44)
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及美国的军国主义	(49)
九、初步印象 1971——1972	(58)
十、中国的劳改所	(64)
十一、历史对中国领导层的影响	(70)
十二、寻求中国人的个性	(76)
十三、江青	(79)
十四、危机四起的 1976 年	(83)
第三部分 通向正常化的道路	(90)
十五、重新评价中国 1962 年与印度的边界战争	(91)
十六、毛的向外转变和尼克松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99)
十七、解决“一个中国”的问题	(103)
第四部分 文化大革命	(111)
十八、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11)

十九、山西一村庄的革命与改革	(115)
二十、怎样当红卫兵	(120)
二十一、毛极力推行新教育制度	(123)
二十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	(132)
第五部分 附带结果：美国不抱幻想的乐观	(140)
二十三、我们仍面对两个中国	(141)
二十四、中美的共同点与问题	(146)

引言

美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

我们感到，要了解我们自己尚且不易，而要认识一个与我们有着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像中华民族那样的相距遥远的民族那就更难了。然而我们仍在努力探寻着——也许我们的研究工作正在取得某种成果。

譬如，美国人信仰的人权，我们目前还未充分认识到它与文化的联系。简要地说，这是因为基督教与儒家学说在对人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遗训。两种文化在个人奋斗与集体协调一致方面有着悬殊的差别，然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三千多年历史沿袭下来的基本色调，要改变谈何容易。

再譬如，美国对个人的关心还体现在法律上对动机问题的明确规定。法律规定蓄意将人致死的人为凶手，而意外将人致死并无杀人动机的人可定为杀人罪，但在判刑时与对凶手的处罚是有区别的。而在旧中国情况就不一样，在判案时即使缺乏杀人动机，也不会减轻处罚。历史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

以说明这点。1821年，一位名叫特拉诺瓦的美国海员将一个罐子扔出船外，不幸打中卖杂货的小贩船上的一位中国妇女，该妇女落水后被淹死。为了使在广州的贸易业务不受影响，美国商人将特拉诺瓦交给了中国法官，按照中国的法律，法官将特拉诺瓦立即判处了死刑。类似的例子导致了外交豁免权的产生，在1844年签订的第一个《中美条约》对此作了充分的解释。至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取缔之前的一个世纪以来外交豁免权（或叫做美国驻华领事馆官员对在华美国人及其财产的司法权）是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外交豁免权给了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一种特权，同时也防止了大量敌对情绪的产生。

总之，在帝国主义时代，我们和英国人在中国要求的外交豁免权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权。现实与历史以一种我们还未察觉到的方式紧密联系着。在中美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这样的背景——美国一直期望着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然而这种期望至今尚未实现。基督教布道团顽固的传教士们凭着他们的热情和冲动把我们文化中的精华传给中国人，他们著书立说，然而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总是一味地表白我们的文化价值，而中国人则用他们的文化价值来回答我们。为了迎接正在迅速发展着的但仍含着未知数的中美关系的前途，我们美国人应该注意到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形成的。

当然，这种形象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论题，它首先是由美国那些所谓的中国通们创造出来的，他们当中不乏去中国的旅

游者、传教士、领事馆的领事、商人以及学生。旅游者回国后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转告自己的同胞。这样得出的形象充其量只是一个拼凑各种观点并仍在不断变化着的万花筒。教科书、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以及评论文章都不断努力描绘出中国的形象，而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自认为从这些含糊的、非本质的报导中获得了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至少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一贯是这样认为的。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长期而又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懂得一点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

在 200 年来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是从零开始的。开初美国人继承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带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烙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当英国和荷兰已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时，美国除了知道中国就是那个曾为 1773 年的波士顿茶会提供茶叶的国家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受到启蒙运动热情的影响。早期的传教本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关系是由耶稣会展示出来的，收集在题为《通信集》里的耶稣会的报告当时广为流传。报告用充满孔子经典的理想词汇描绘中国，并报导耶稣会中国信徒们的思想，这些信徒都是科举制度传统思想加工厂的产品。皇帝的超自然的英明和仁慈（除了他让那些胡思乱想的人皮肉受苦之外）总是能满足人民生存的需要。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欧洲人相比，事实上还是相当不错的，启蒙运动的专家们采用耶稣会对中国理想性描绘的报告，向人们表示，即使没有天启教过多的恩惠，人也可以走进文明。启蒙运动产生

的中国形象是抽象的、神秘的和不现实的。

十九世纪初，伴随着美国国内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美国在与中国的实际接触中认识到有关中国的神话是不真实的，从此幻想开始破灭。十八世纪当欧洲人将便壶中的小便还随意向街沟里倾倒时，中国人已经懂得将粪便收集起来加以处理用作肥料，但当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在欧洲广泛使用时，中国却落后了。到广州做生意的欧洲人一看到那些粘糊的粪便就感到中国已很快被抛到了后面。中国缺乏蒸汽机、大炮和其他文明支柱。法制变革、警察和医院的出现还是西方近代发生的事，西方率先掌握了近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科学和民族主义。中国没有注意到西方的这些进步，以至于今天还在赶超世界水平。

十八世界梦幻中的中国形象直接被极度贫困的中国所取代。复兴的耶稣教曾派遣它的美国传教士到异教徒中传教。可以断言，西方的强大正是由于有了工业、民主和基督教这三大法宝。如果中国的士大夫认为自己比西方人懂得多，他们也无法证实这点。不可否认，在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军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造诣较深的传教士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人与中国的接触增多，幻影破灭，一位名叫韦尔斯·威廉斯的传教印刷商写了一本内容极其丰富全面介绍中国的书：《中央王国》（1848）这两卷本的大著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和中国人一对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和宗教等的研究。1883年该书再版时作了修订并扩充了内容，副标题略有不同：中华帝国和中国人一对中华

帝国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等的研究。正是这本广为流传的书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的观点是既要从整体又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各种文明。譬如研究中国，就决不能将她的语言、历史、文化割裂开来，从诸多方面来对中国进行研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汉学”。

《中央王国》包括两部分材料。第一部分是从“中国博物馆”收集到的 1832 年以后传教士们在澳门和广州出版的杂志，这部分材料属于英美传教士创立的中国沿海早期汉学的内容。第二部分收编了威廉斯对中国前现代化问题的直接观察，这部分材料使威廉斯本人和他的读者确信中国人不仅需要蒸汽机和标志西方物质文明的抽水马桶，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总之，美国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此处再度被奉为圣旨：“我们有的，他们没有，我们应该把自己有的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变得更象我们并追求我们的理想”。直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美国人仍企图把科学技术其中包括社会科学和以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教义给予中国人。很明显，我们所取得的进展都未超越《中央王国》这本书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和基本态度。简而言之，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史表现出文化价值的高度连续性。

继威廉斯的《中央王国》之后，出现了一批威廉斯的继承者，其中包括赖德烈，他的著作有《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及文化》(1934 年)，还有其他很多著作不一一列举。在赖德烈的那个时代，对中国经典著作和历史的现代研究已取得很多有学

术价值的成果，但是，中国古代的荣耀和现代的落后之精彩场面却显得更为突出，这点今天仍是如此。我们感到庆幸，是英国而不是我们用军舰捍卫了“外交豁免权”。在印度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英国又将我们排除在外。我们的纪录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和善好施。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之间有着特别良好的关系，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的政策是与所有的外国入侵者只保持一种，关系无一例外。

另一本广为流传的书《中国人的特征》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幻影的破灭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该书作者阿瑟·H·史密斯曾在山东农村生活过多年，他亲自观察了中国人的习惯并想从最底层对中国人进行基督教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陆续出了一些小册子，直到1894年，《中国人的特征》才正式出版。本书用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对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述，书中用了大量第一手反映社会差异的材料，为后来的社会分析奠定了基础。史密斯着重强调是“贫穷”和“社会的高度一致性”构成了文化的差异，而中国对社会学的研究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开始。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也始于二十世纪。西方在一系列战争之后签定了不平等条约，这就强行扩大了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在特权合法化的背后有极其复杂的关系。在H·B·莫尔斯所著的“中华帝国的外交关系”第一卷(1910年)，第二、三卷(1918年)中，对这种关系作了详尽的叙述。H·B·莫尔斯曾作为帝国海关特派员为中国政府工作了33年，对中国的官场内幕相当了解，他所著的有关外国势力如何在中国确立

其地位的文章为不平等条约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美国开始把中国——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度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用美国的文化观念对启蒙运动描绘的理想化中国和十九世纪所接触到的落后的中国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从这种分析中获得了一种全面认识中国的方法。然而，顽固的、旧的习惯随时都可能影响美国采用正确的态度，近代史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左右摇摆，这种摇摆充分说明旧的方式仍在起作用。

第一个例子是 1900 年反帝的义和团起义，这次起义制造了十九世纪最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狂热的起义者在清王朝的支持下包围了当时北京公使馆区里的 475 名外国人，450 名来自八个国家的军人，大约 3000 名中国基督徒以及 150 匹赛马（这些马很快就被吃掉了）。因为欧洲各国能相互协调彼此的势力，也能容忍各自的帝国主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超级大国的对抗。而在亚洲情况就不一样，俄国轻易地接管了满洲，直到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才将俄国人赶出那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国际生活中已跃居前列。当多国联军拯救了公使馆之后，义和团退回到农村从此便消失了。为了在中国维护有利于外贸的安定环境，外国势力保留了清王朝。在美国人看来，1900 年的中国是一个比欧洲文明低劣得多的，还处于异教徒野蛮状态中的国度，直至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也未能摆脱这种野蛮。

然而，1900 年的危机反而使美国制定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主张美国要接近中国，而且还力图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幅野蛮落后与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民族精神两种色调交织在一起的图画。义和团危机十年后，中华民国于 1911 年成立。总的说来，美国欢迎这个新政权，并乐观地估计，这样一来，中国就会逐渐变为像美国那样的基督共和国。紧接着我们哀叹军阀时代的政治混乱，与此同时我们却资助开办了十余所教会学校。我们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入侵。当日本通过 1915 年与中国签定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巩固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进而对特权方面超越西方帝国主义时，美国的公众舆论完全站到了中国一边。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签条约保留了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抢到的在山东的地盘，我们拒绝承认该条约。从那以后直到 1949 年的 30 年里，我们一直尽力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像“悠悠”玩具一样，一直处于波动状态。

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掌权时期（1928—1937 年），外国人对该政府都寄予希望。认为这个政府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不幸的是，国民党一上台，就背叛了它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杀害了在城里抓到的共产党人并迫使像毛泽东那样的幸存者上了山。1931 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导致了中国的全面军事化，从而钳制了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

然而,迫使革命知识分子生活在农民当中,这就等于制造了一种爆炸混合物。当时珀尔·巴克的畅销书《沃土》(1931年)把中国农民的眼界提高到了美国公众的水平,毛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学习如何调动农民去夺取政治权力。一位年轻的堪萨斯新闻工作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1937年)中讲述了毛泽东的故事,墙上的手写体“红星”两个字历历再目。

但是,美国执行的是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尽管我们投资大,回收极少,可我们仍与蒋介石做生意。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蒋和国民党已证明对共产党的接管完全无力对抗时,美国的幻想才真正破灭了。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向外国观察者展示了自己的优良素质以致不少研究中国的专家对共产党寄予了希望。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已参与了杜勒斯所说的由莫斯科导演的“垄断的无神共产主义”的全球阴谋时,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美国没有农民,所以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这个反基督的发源地才可能发起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冷战时期可称为极权主义状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人哀叹中国共产党折磨和杀害了那么多自己的敌人的不良作法,而另一些人则颂扬这种作法,认为这为解放农民和让火车正点运行清除了障碍。

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时,早年的美国观察者在延安获得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我们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坏印象所干扰。当1979年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时,